

后牵线人，则是总揽军政大权的野心家袁世凯。就这样，这个无知无识、浑浑噩噩的小皇帝，糊里糊涂地当了三年政治玩偶，尔后又糊里糊涂地被赶下台，退了位。

据当事人回忆，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十二月初二举行登极大典那天，天气奇冷，年仅3岁的溥仪，被人抬上了太和殿，放在又高又大的皇帝宝座上。由于紧张、害怕，他号啕大哭，连声叫喊：“我不挨（待）这儿！我要回家！我不挨（待）这儿！我要回家！”他的父亲、摄政王载沣扶着他，急出了满头大汗，一个劲地劝哄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快完了，快完了！”这番话，曾引起在场的王公大臣窃窃私议，认为太不吉利，乃是“不祥之兆”。果真，很快他就下台、完蛋了；而后便回到了老家——他的出生地醇亲王府。

当时，根据《清室优待条件》，“大清皇帝辞位之后，尊号仍存不废。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”，仍然留在紫禁城里过着异化了的帝王生活。但“光复故物”、“还政于清”的复辟活动，却在暗地里酝酿着、筹划着，由王爷、师傅、内务府大臣们指导着溥仪去扮演这种角色。“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”，溥仪回忆说，“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，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。说起来滑稽，却是个事实：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。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，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”。

其实，这种寄托也是大谬而不然的。袁世凯惦着复辟倒是不假，但他想的却是自己当皇帝。只是，好景不长，仅仅83天，还没等龙墩坐热乎就被气死了。继任民国大总统的是黎元洪。于是，紫禁城里的“小朝廷”又派人前去祝贺，寄希望于新的权贵。黎元洪也派了代表答谢，并将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了紫禁城，“小朝廷”的内务府又开始活跃起来，拟旨赐谥法、赏花翎顶戴，又授什么“南书房行走”，又给太妃们选秀女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而在国民政府那面，巨头间的矛盾已趋于激化，军阀割据、纷争，日甚一日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一向效忠清王朝的北洋系军阀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勋等人，认为复辟的时机已到，遂于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6月14日，以调停为名，率领三千名“辫子兵”进驻北京，康有为也不甘寂寞，赶忙化装成乡下老头，揣上事先拟好的“复辟诏书”，潜入了紫禁城。于是，一场复辟清王朝的闹剧开演了。

伴随着“宣统”年号宣告恢复，溥仪便又重新登上了皇帝宝座，颁发了一系列封官授爵的诏书。当时北京城里，一片乌烟瘴气，警察们通知各户悬挂龙旗，居民们一时找不到，就用纸糊的来应付；一些遗老遗少纷纷放下头上已经盘起的辫子，找出压在箱底的蟒袍，或者到估衣店里租买，然后匆匆赶到皇宫，准备入朝受封承赏。结果，满街上奔跑的都是一些仿佛“从画上走出来的人物”，到处拖着辫子与花翎顶戴。报纸出版了报道复辟消息的“号外”。只是，这场闹剧开场突然，收场也快，不到12天，宣统皇帝便被赶下了台。

尔后，溥仪又是昏天黑地、纸醉金迷地混了几年。直至1924年11月5日，民国政府强行修正了《清室优待条件》，其中重要一款是“即日移出宫禁”。这样，溥仪连同他的“小朝廷”便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出紫禁城，回到了由国民军把守着的醇亲王府。

据溥仪自己讲，当时，他面临着三种出路可供选择：一种是按照新的条例规定，放弃帝王尊号，抛开固有的野心，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“平民”；二是争取“同情者”的支援，取消国民军新订的条款，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的“优待条件”，或者“复号还宫”，重新返回紫禁城，仍然过着旧式的生活；三是走最曲折的路线，“借助外力以谋恢复”。最后，在“亲日派”的怂恿和支持下，他作出了第三种选择，被野心勃勃的日本关东军物色为理想的傀儡角色。

这时的溥仪，已经步入青年时期。为了实现这“第三种选择”，他从走进北府大门那天起，一直到离开天津去东北之前，日夜筹划着“借助外力以谋恢复”，可说是殚精竭虑，费尽心机。而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强占了我国辽东之后，也正在加紧策划建立傀儡政权。在日本人看来，要侵占中国，必须先物色一个政治傀儡以为“遮羞布”。这叫做“欲渡河而船来”，于是，二者珠胎暗结，一拍即合。

当时，溥仪的周围活跃着几派势力：有以旧臣陈宝琛为首的“还宫派”，有以罗振玉为首的寄希望于外国、主要是日本的“联日派”，也有的主张联络、收买军阀，即“用武人”一派。这里既有前清的遗老，也有民国的政客，包括了各色人等，当然，中心人物还是溥仪自己。“联日派”中有两个人起了特殊作用：一个是做过清朝驻日本神户领事、深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。起先他并不属于某一派，好像哪一